

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 291 家农户的调查

吴园庭雁, 杨君*

(湖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基于湖南桃江县和长沙县 291 户农户的调研数据, 从生计多样性和优势生计收入比重两方面揭示了农户生计策略“单一生计——生计多样化——优势生计”的路径演变规律, 农户生计多样性先升高后降低并趋于稳定, 优势生计收入比重逐渐增大。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对农业土地利用集约度、利用结构和经营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表现在土地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取代劳动力投入趋势明显, 土地利用类型和种植结构朝着高收益、低劳动投入的方向调整, 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

关键词: 农户; 生计策略; 生计多样性; 优势生计; 农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7)02-0065-05

Evolution path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91 farmer households in Hunan

WU Yuantingyan, YANG Jun*

(College of Resources & Environment,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91 peasant households in Taojiang county and Changsha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from two aspects of livelihood diversity and the income proportion of advanced livelihood,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single livelihood –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 dominant liveliho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velihood diversity appear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decreasing-stable, and simultaneously the income proportion of advanced livelihood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evoluti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ha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utilization structure and operate manner, which means more funds and material instead of labor inputting on land, land use types and the cropping patterns adjusting toward the high yield and low labor input pattern, scale and specialization of land operate improving.

Keywords: farmer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diversity; advanced livelihood; agricultural land use

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计演变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1-2]。农户是农村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 其生计策略选择和演变关系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也会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产生影响^[3]。针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直是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要内容^[4], 它对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维护社会稳

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中国农区产业结构及农户行为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6], 农户的生计方式也由以传统农业为主向兼业和非农转变, 并成为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7]。

学界对农户生计的研究多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其生计结果进行分析, 然而微观视角的生计分析难以将农户生计策略与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联系起来^[8]。在生计策略演变研究中, 学者主要从景观格局变化^[9]、土地利用、覆被变化^[10-11]等方面

收稿日期: 2016 - 12 - 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质监局资助项目(141001200999)

作者简介: 吴园庭雁(1992—), 女, 湖南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管理。*为通信作者。

进行研究,而对农户行为的关注较少,特别是关于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及其对土地利用影响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为此,笔者拟选择湖南省长沙县和桃江县的7个乡镇21个村共291家农户进行调查,从生计多样性和优势生计收入比重变化的角度研究农户生计策略演变规律,并分析其对农地利用集约度、利用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影响。

一、农户类型及其生计策略

长沙县和桃江县作为湖南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县域和欠发达县域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长沙县是隶属长沙市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土地面积为19.97万 hm^2 ,总人口79万,农业人口69万,2012年人均GDP为8867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070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桃江县隶属益阳市,土地面积20.63万 hm^2 ,总人口88万,农业人口77万,2012年人均GDP为1941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688元,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南省处于中下水平^[12-13]。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距离县城的远近,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桃江县和长沙县分别选取3~4个乡镇。其中,桃江县选取桃花江镇、石牛江镇、灰山港镇,长沙县选取黄花镇、春华镇、果园镇、跳马镇。通过对乡镇、村干部及典型农户的访谈,并基于农户生计策略的代表性,在各乡镇分别选取3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10~20家农户共291户,进行深入问卷调查。样本农户的选取原则如下:兼顾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涵盖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农户;所选择的农户为本地农户。农户调查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选用调查问卷等PRA工具进行调查,数据基本可靠、有效。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年龄、从事生计活动等基本情况;生计资本情况;农户生计方式及生计策略的选择情况;农用地利用类型、经营、投入产出情况等。

借鉴已有农户分类研究^[14],根据调查结果,按照农户收入结构和土地经营规模,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农户、农为主型农户、非农为主型农户、非农型农户、规模经营型农户5类(表1)。生计策略指为了实现生计目标而对资产利用和经营活动的选择,包括生计多样化、农业集约化、农业规模化、非农化等。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区域农户生计策略主要

有作物种植、林木种植、常年外地务工、本地务工、养殖、自主经营、工资性工作等7类。

表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农户类型	农业收入占比/%	户数	比例/%
纯农型	90~100	40	13.7
农为主型	50~90	32	11.0
非农为主型	10~50	52	17.9
非农型	0~10	149	51.2
规模经营型	90~100	18	6.2

注:规模经营型农户指耕地面积1.33 hm^2 的农户。

作物种植是各类农户传统的生计策略,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农户却更多地依赖非农活动维持生计。农户从事的非农生计活动主要是常年外地务工以及本地务工,少数农户从事花木种植和养殖。农户在外地务工与本地经济特别是乡镇非农产业发展滞后、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少有关。近年来,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本地就近务工的农民数量已经增加到农业人口的27.6%。农户本地务工主要集中在距离县城较近的乡镇。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地区之间农户生计策略也存在一定差异。桃江县农户家庭收入中有18%来自农业,长沙县为15%。长沙县隶属湖南省经济中心的长沙市,经济发展水平比桃江县高,本地就业机会较桃江县多,因而农户本地务工比例比桃江县要高。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明显存在差异:纯农户只种植作物;农为主农户主要从事作物种植和本地务工,家庭收入中大部分来自务农收入。与农为主农户相比,非农为主和非农型农户本地务工比例明显偏低,很多在外地务工和进行自主经营,其中非农型农户外地务工数量明显比非农为主型高。非农型农户的生计非农化程度最高,其90%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活动,作物种植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消费;约有14.8%的从事农家乐、小型加工厂、运输、商店等自主经营活动,其中45.5%的愿意扩大经营规模。规模经营型农户是指经营农地面积大于1.33 hm^2 ,且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于90%的农户,其主业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主要生计策略为专业化、规模化的作物、林木种植,或牲畜、家禽、水产养殖,或提供有偿农机服务的自主经营等。

二、农户生计策略演变的趋势

农户经常因为自然环境资源、生计资本、经济发展以及自身预期的影响而改变生计策略^[15]。近年来,受地区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调整的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291 家农户的生计多样性指数的演变表明其生计策略有向多样化和优势生计演变的趋势。

生计多样化是指农户选择多种生计活动,通过对生计资产的综合利用来提高生活水平,包括农业活动方式多样化、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非农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和农户迁移等^[13]。不同类型农户对于生计策略呈现出不同的变迁愿景和路径。42.5%的纯农户愿意以有偿出租或无偿的方式减少作物种

植面积。农为主型农户愿意在本地务工,扩大种植规模,通过种植较高经济效益的林木,以获取更多的收益。非农为主型和非农型农户除从事本地务工和常年外地务工以外,一部分农户愿意减少作物种植面积,将土地出租获取可观的租金收益。规模经营型农户更愿意选择扩大种植规模或者调整种养结构。

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出各类农户生计策略的平均数作为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以及各类农户优势生计收入与家庭总收入比值的平均数即优势生计收入占比,并依据农户对今后的优势生计预期收入占今后预期总收入百分比估算出“今后”优势生计收入比重,以直观地看出农户生计策略演变的趋势。测算结果见表 2。

表 2 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和优势生计占总收入比重变化

农户类型	地区	生计多样性指数			优势生计收入占比		
		过去	当前	今后	过去	当前	今后
纯农	桃江	1.65	1.31	1.22	0.752	0.934	0.944
	长沙	1.74	1.57	1.33	0.660	0.857	0.871
农为主	桃江	1.69	2.10	1.36	0.595	0.795	0.892
	长沙	1.75	2.23	1.72	0.661	0.897	0.930
非农为主	桃江	1.36	2.18	1.73	0.502	0.767	0.856
	长沙	1.88	2.25	1.78	0.740	0.828	0.940
非农	桃江	1.83	1.96	1.63	0.811	0.925	0.973
	长沙	1.73	1.87	1.60	0.837	0.866	0.956
规模经营	桃江	1.82	1.91	1.45	0.549	0.750	0.895
	长沙	1.29	1.79	1.43	0.692	0.855	0.882

各类农户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总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然而,纯农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指数却一直在减小。长沙县的非农为主型农户、桃江县的非农型和规模经营型农户在过去的生计多样性指数较高,分别为 1.88, 1.83, 1.82。非农为主型农户当前的生计多样性指数最高,其次是农为主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最低。非农为主型农户今后生计多样性指数最高,纯农型农户最低,分别为 1.73, 1.22。农为主型农户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同时也在本地从事临时性的非农劳动,随着其生计非农化程度越高,生计多样性指数逐渐减小。大多数规模经营型农户愿意在今后扩大经营规模,当前从事的生计活动中的非农部分会逐渐减少,生计多样性指数也会减小。

生计多样性反映的是农户生计的兼业化程度,为分析农户生计的专业化程度,特引入优势生计概

念。优势生计是农户从事生计活动中主要的、收入最高的生计活动,优势生计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可反映农户生计的专业化程度。一般而言,农户生计的专业化程度越高,收入也就越高。从表 2 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农户优势生计收入比重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表明农户生计的专业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桃江县非农为主型农户在过去的优势生计收入比例最低,长沙县非农型农户最高;桃江县的纯农户当前优势生计比重最高,规模经营户最低;桃江县和长沙县非农型农户的优势生计收入比重最高,分别达到了 0.973、0.956,表明其生计专业化程度较高。桃江县非农为主型农户优势生计收入比重的变化最大,长沙县规模经营户变化最小。总体上,农户生计的非农化程度越高,其优势生计比重越高,生计的专业化程度也较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长沙县农户的优势生计收入比重高于桃江县,桃江

县和长沙县同一类型农户的优势生计收入比重也会有所差异。如由于长沙县非农劳动机会高于桃江县,桃江县纯农户的优势生计收入比重高于长沙县。

基于农户生计多样性和优势生计收入比重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兼业化和专业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户生计策略总体呈现出“单一生计——生计多样化——优势生计”的演变规律。其中生计多样性指数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优势生计收入比重随着农户生计活动专业化程度提高而逐渐增加。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大体经历两个阶段:生计多样性增加,生计兼业化程度提高;生计多样化到达一定程度后,农户逐渐放弃一些非优势生计活动而选择优势生计,生计多样性降低,生计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并最终趋于稳定。

三、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随着农户生计策略朝着“单一生计——生计多样化——优势生计”的路径演变,农户在土地利用集约度、利用结构、经营方式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方面,土地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取代劳动力投入趋势明显,规模经营户的规模化种植提高了土地产出;土地利用类型和种植结构总体上朝着高收益、低劳动投入的方向调整;在土地经营方式方面,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

1. 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直接反映在土地投入与产出上。对土地的投入主要有劳动力、资金和物质的投入,反映了土地利用的集约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土地劳动力投入明显减少,55.0%的劳动力已经向本地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的平均机会成本高达150元/人/天,农户的非农化导致土地劳动力投入减少。其中,23.4%的非农为主和非农型农户将施用除草剂、农药和化肥等传统农事活动承包给了专业农事人员。非农为主、非农型农户劳动投入为2700元/hm²,规模经营型农户为2400元/hm²,纯农户的劳动投入最高为3600元/hm²。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而言,土地的资金投入存在差异。纯农户普遍选择价格较为便宜的作物品种,尽量少施用农药和化肥以控制成本,但劳动力投入、有机肥施用比其他类型农户高。规模经营农户对良种的选择较为谨慎,大都经过多

年的种植经验对比进行选择。在农药和化肥的施用方面,大户会综合考虑天气、成本、效益、土壤等因素适时适量科学施用。非农型农户最倾向于通过增加化肥、农药和机械的投入来达到减少劳动力投入的目的。最后,不同类型农户物质投入差异大。非农型农户的化肥和农药单位面积施用量最高,规模经营农户更趋于理性。因此,资金和物质投入代替劳动投入是农户土地利用的最为显著的变化。

2. 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和种植结构变化。随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成本的增加,农户倾向于选择收益高、劳动投入少的种植方式,因而土地利用类型和种植结构也会朝着高收益、低劳动投入的方向变化。首先,农户的土地更多地倾向于花木种植。当然,花木种植虽然收益高,但是劳动和资金投入大、技术性强,对于缺乏农业劳动力的纯农户、非农为主和非农型农户均不适合。调查显示,长沙县花木种植已经达到1.2万hm²,其中长沙县跳马镇花木种植面积5613hm²,占到全县花木种植面积的46.7%。其次,基于不同的利益驱动,各类农户在选择种植单季稻还是双季稻上呈现出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取向。由于双季稻投入的劳动力较单季稻更多,虽然当地政府对双季稻按种植面积进行补贴,但是对于非规模经营农户而言,更倾向于种植单季稻;对水稻种植大户而言,高额的双季稻种植补贴是他们选择种植双季稻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研究区域存在两种土地利用结构的分化:非规模户越来越多地种植单季稻;规模户种植双季稻。

3. 对土地经营方式的影响

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对土地经营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两个方面。农户生计活动的非农化使得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大量农户愿意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和公司获取租金。加之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鼓励,土地流转、农业补贴等政策相继出台,政府土地流转中介机构成立,土地规模经营日益普遍。以桃江县为例,2013年全县已流转耕地面积22010hm²,占耕地总面积的51.1%。其中,桃花江镇2hm²以上的规模户达到408户,经营土地面积2218hm²,占该镇流转土地面积的63.0%。种植大

户的规模化经营提升了作物种植的专业化程度。另外,一些农为主型农户从事经济价值更高的花木种植,农业企业从事优质粮食作物、蔬菜、水果、林木等种植也导致了土地经营的日益专业化。

长沙县和桃江县的农业和农村正处于快速转型期,随着乡镇和县域经济的崛起,农民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非农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农户的生计策略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对转型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掌握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演变规律,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发展地方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扶持农村合作组织,进而实现转型期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Colin B, Scott W. Agrarian chang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modelling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Tibet[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13, 115: 83-94.
- [2] 王成超, 杨玉盛.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11, 31(11): 1362-1367.
- [3] Eija S. Land use change patterns and livelihood dynamics on the slopes of Mt. Kilimanjaro, Tanzania[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5, 85(3): 306-323.
- [4] 赵雪雁, 李巍, 杨培涛, 等.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4): 111-118.
- [5] 李翠珍, 徐建春, 孔祥斌.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6): 1039-1049.
- [6] 梁流涛, 许立民.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3): 63-69.
- [7] 王成超, 杨玉盛.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效应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792-798.
- [8] 梁守真, 李仁东, 许国鹏. 洞庭湖区湿地景观变化分析[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7, 15(6): 171-174.
- [9] 潘明麒, 于秀波. 不同时段洞庭湖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退田还湖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9): 140-145.
- [10] 李仁东, 庄大方, 王宏志, 等. 洞庭湖区近 20 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时空特征[J].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2): 164-169.
- [11] 李静芝, 朱翔, 李景保. 环洞庭湖区水资源供需系统仿真及优化决策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3, 28(2): 199-210.
- [12] 董力三, 熊鹰. 洞庭湖区农业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历史演变[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6, 27(4): 285-288.
- [13] 覃永晖, 于小樵. 环洞庭湖区村镇水生态系统的问题分析与整治对策[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0, 31(5): 6-11.
- [14] 徐玉婷, 杨钢桥. 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106-112.
- [15] 李聪, 李树苗, 梁义成, 等.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 32(3): 77-85.

责任编辑: 曾凡盛